

百年前中国海军的一次远洋航行

□ 赖某深

中国海军首次远洋航行，是在1881年，池仲祐的《西行日记》留下了珍贵的记录。时过六年，中国海军第三次前往欧洲接舰。亲身经历这一重大事件的余思诒写下《楼船日记》（又名《航海琐记》），记载与邓世昌一起护送新近竣工的“致远”“靖远”“来远”“经远”四艘军舰回国行程中的所见所闻。此书是研究北洋海军史乃至中国近代海军史的重要资料。

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在英国订造的“致远”“靖远”军舰及一艘鱼雷艇、在德国订造的“来远”“经远”军舰均已竣工，相继开抵英国著名海港朴茨茅斯（书中称之为“抱士穆德”）集合。北洋大臣李鸿章上奏，应“派员护送，沿途照料，以昭慎重”。经李鸿章推荐，驻英公使馆随员余思诒与参将邓世昌等人护送军舰回国。由英国人、李鸿章高薪聘请的北洋水师总教习（总查）琅威理担任接舰部队的统帅。七月二十五日，从朴茨茅斯启程，至次年三月十五日，四艘军舰抵达天津大沽。

日记的重点，是记述“楼船”东归的经历。接舰的过程，其实也是北洋水师演练的过程，而这些演练的情形，极少有人记录下来。作为关心海军建设的有心人，余思诒记得多、记得细。航行至大西洋时，舰队不断变化阵法，“终日间变阵必数次，或直距数百码，或横距数百码，或斜距数百码”。不时进行“水险”“火险”“备攻”“攻敌”的演习。“皆悬旗传令，莫不踊跃奋发，无错杂张皇状”。航行至印度洋时，有天晚上忽然从指挥舰传来预备迎敌的命令，“舟人皆起，各站汛地，启火药舱，船主登令台调度，约一时许始撤防”。

北洋舰队中，长期有“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之说。丁军门指丁



汝昌，是北洋舰队提督。琅副将指洋员琅威理。整个航程中，总查琅威理军纪严明，训练极为严格，甚至“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以七月二十六日为例，上午各舰例行操练，午后练习站炮位。不久琅威理从乘坐的指挥舰“靖远”号传令舰队改单雁行阵。不久传令打慢车，过一会儿又传令打快车。随即又传令舰队改波纹阵。又用旗语接连询问各舰，一小时用煤若干？四小时用煤若干？存汽若干？酉初（下午五点），传令速备炮弹。训练过程中，“凡行阵参差错落，必诘责；答词迟缓，必诘责”。训练强度之大、要求之高、军纪之严可以想见。

作者与“致远”管驾邓世昌同乘一船，因而能近距离观察这位在甲午战争中壮烈殉国的杰出将领。在作者笔下，可见邓世昌技术娴熟、带病履职、严格约束士兵纪律、宁愿冒着违反军纪的风险也要挺身而出帮助海外受苦受难华工回国等优秀品质。

在接舰部队中，有12人（每舰3人）是来自国内各水师学堂的学生，他们在水师学堂是怎样学习的呢？

初入学堂，先学水手事，如打绳

结、上桅杆、帆篷记号等。又习枪炮、陆军行阵兵丁之事。速上练船，尚是水手之事。遇风大浪猛之日，教习必令荡舢舨；逮诸生力乏不能前进，始自放舢舨来援。皆所以练手、练心、练胆也。至于测远近，较迟速，甚属微渺；风力、水线，必根算学乃成。按图行船，尚是易事。

也就是说，水师学堂的教学，是要通过一系列训练，对学生“练手、练心、练胆”，首先将他们培养成一名能在大海航行中披荆斩棘的优秀水手。

这些学生在船上又是如何实习的呢？八月初五日记：

学生之在船演习者，皆才技已成者也，分班随同治事。如在望台驾驶，苍海茫茫，水天一色。凡有船来，遥见一桅，即报有船来；得见旗，即报某国船；既见几桅、几烟筒，即报某国几等船；见旗式，则报某国、某某船、几等某官某人。该管官若考之，则询兵若干，炮若何，速率若干，容积若干，我炮能攻否，我速率能及否，我船能受来船之炮否，应距若干码开炮，应距若干码备来船之炮，我船速率不及，炮力不及应如

何预备。学生应照书中所纪、平日所知者，一一皆答之，而后退不能者罚责。此水师之定程也。

只有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经验，才具备实战技能，才具有杀敌的本领。

海军是个高科技军种，要在海上克敌制胜，就必须掌握现代军事科技知识，作者亲身参加护舰回国，对此深有体会：

始知海军将士必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方克乘风破浪，攸往咸宜。其笃学者，尤必博涉西书，勤求格致，不仅明制造、解测量、习风潮、熟沙线、辨海图，能擅偏长已也。于以知御外侮，固海疆，张国威，尊国体，胥在乎是。

中国人在海外的情况，作者极为关注。八月初五日，有两在西班牙作苦役的广东人被邓世昌解救，来到“致远”舰作工。作者问他们为何来到西班牙，答称是被人口贩子拐卖的“猪仔”；问其作工如何，答称“苦甚”；问其为何不逃跑，答称“不能逃，佃主以狗监之。佣人若逃，主则毙狗。狗惧，嗅迹跟寻，见则啖衣不释，逃将焉往？”作者听了，极为愤懑，感慨“呜呼，‘猪仔’人而不如狗乎！”

中国军舰航行所经之地，民众反应如何？日记有生动的记载。当在新加坡时，华商欢欣鼓舞、“莫不额手称庆”，成群结队上船参观。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当地人奔走相告，“莫不遮道欢迎，举手祝贺”。在英国所占领的南海，“见我龙旗船来，炮台鸣炮申敬，相率来观者，士女如云。女则扬巾，男则脱帽，举手欢呼‘克欧罗，克欧罗！克欧罗者，译音‘无美不臻，皆大欢喜’”。

作者将克欧罗（hello）翻译成“无美不臻，皆大欢喜”的确有些夸张，但旨在宣传“我武威扬，邦家之光”，长中华之志气，却可以理解。

回国以后，作者拜会了两广总督张之洞、北洋大臣李鸿章、前驻英公使曾纪泽等人，又与戚友叙旧，闲谈中诸人问得最多的是西方国家的海防、机器制造、民生以及出洋的最大收获等问题，作者都做了简明扼要的回答，从中不难看出其卓越的意见。



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这句话包含几层意思：中国人相信，历史是一个高于个人意志的至高存在，个人虽然是历史的参与者，但历史有它自己运行的轨迹，比如中国人特有的循环观就是这种历史思维的代表，历史被赋予了天命的性质，人只能参与其中，但不能决定它。中国人还相信，历史能给人答案，知道历史怎样走来，也就为当下的问题提供了某些答案，甚至还能预料历史将怎样走向。中国人也相信，历史可以实现正义，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正义终会到来，而且是在现世中。这些深植人心的观念促使我们与史结缘，不但重视历史的物质载体的保护，更重视写史和治史，以满足求真求善的深层动机。

发现历史轨迹、研判历史走向可以归纳为求真的动机，在历史中寻求正义则是求善的动机。这两种动机同等重要，而且不可分离。

历史的求真和求善在另一个方面也很让人着迷，即通过对某时段社会的透析，发现其社会运行的隐秘，这种真相的揭开是充满趣味的；而结合这些真相，想象某个人在那时那地会遇到的种种困境和选择，也会牵动人心。

陈良先生的《走出迷局——审视历史中的人性制度》（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系“政治文化丛书”之一），正是满足这两种动机的精心之作。作者细致挖掘了中国历史兴亡更替的制度和人性原因，对某些历史的可能给出设想。首先是思考治世产生的条件和环境，所谓治世，是传统策论话语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政通人和”，而用现代经济学社会学视角去看的话，“政通”背后必有合理的土地制度、财政制度、分配制度，使社会中大多数人能够获益，实现公平；也须有适宜的行政体系、官僚体系使政治顺畅运行，实现公正。“人和”既是“政通”的结果，又是“政通”的条件。用博弈论的视角去看的话，政通人和是社会各方势力经过一段时间博弈后达到某种平衡的状态，在这种平衡状态下，人们普遍感受到社会公平，实现正义的预期较高。良好的制度在制定时是适合当时的条件的，在运行中，条件发生了改变，人性中的某些因素（比如惰性）使得制度不能及时调整，导致制度逐渐失范甚至无效，积累的因素足以打破原有平衡，这时往往在政治局面之善可陈的表象之下，酝酿着各种危机。这个平衡的建立——维持——打破的过程，正是我们熟悉的治乱兴衰的历史过程。分析平衡失衡状态的动态变化，从而提取出一些模式甚至公式，以探析历史奥秘，这是陈良先生一直试图做的。

柏拉图认为“哲学王”是政治治理的最佳状态，虽然这是一种臆想，在现实生活中从未真正实现过，然而这个命题无数次地召唤后来者，通过思考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来给出较优的方案。虽然不能直接成为尧舜，但是至少可以在认知领域给人类开药方，这也正是中国古人如此渴望立言的动因。看来，中西方在这点上上是相通的，即都认为在哲学和史学思考中，是可以实现正义的。具体到历史领域，这里说的正义并非简单的善恶评价，而是对某些模式的揭示，对某些趋势的判断。在产生一种大历史

在历史中寻求正义
——读陈良《走出迷局——审视历史中的人性制度》
□ 曹颖新

观后，就会产生一种能力，不再人云亦云，时刻保持谨慎，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更大的拼图，在宏观视野中去审时度势，这种理性的能力最终会有助于实现正义。

陈良先生就充分表现出了历史理性。在分析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时，他说：“庆历新政因为朋党之争而夭折，王安石变法也因为新旧党争而失败。究其原因，朋党之说基于君子与小人的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结党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谋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不陷于党争的具体是非，不对具体人物事件作出偏颇的评价，而是思考他们共通的局限性，这种洞悉是深刻的，对历史人物也是宽容的。

“义”是天经地义、理所应然的意思，它一直规约着人的行为甚至思想。虽然正义的标准一直在发生变化，从远古社会至今，许多标准已经发生了从黑到白的颠倒。可是大家还是要寻求正义，因为至少在今天的科技医疗水平下，人的一生不过百岁，在他建立认知的过程中，一些价值观念植入他的内心，这些观念是历史形成的。“过去永远不会死去，过去甚至不曾过去”，从基因的角度思考福克纳这句话会深以为然，人类文明的基因就在历史中复制、变异、传承。这些基因可以说具有一种普时性，它可以穿越时间。一个两千年前的小女子缙紫的刚强勇敢至今能震撼我们的心灵（《小女子改变大法度》），消失在历史中的一支军队从巅峰到衰亡的原因还会令今人唏嘘（《神策军的退变》），这些都是作者通过深挖细思呈现给读者的。



全面深化改革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一场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必须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和党的领导不断得到加强，基本适应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力保障了各项事业的发展。但也要看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面对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现行行政体制仍然存在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深化改革势在必行。

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深化改革需要政治勇气和坚定决心，也需要政治智慧和足够的知识。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创新的过程，需要善于研究借鉴国际上公共治理方面的有益成果，顺应时代发展和变革潮流，同时又要充分考虑我国现阶段国情与实际，不盲目照抄照搬，从而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潘小娟教授的新著《比较行政体制》一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帮助。

潘小娟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从事行政体制改革与公共管理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可以说伴随和见证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潘教授治学严谨，富于创新，有着很深的学术造诣，迄今已发表了许多引

起广泛影响的学术著作和文章。《比较行政体制》一书是她多年来以外国行政体制为主题开展教学研究累积的成果，凝聚了她对各国行政体制比较研究的不懈思考和心血。通览全书，感到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别比较突出：

一是为我们思考和研究比较行政体制提供了一个较新的理论框架。区别于传统的按国别展开的行政体制比较研究，作者更加注重从行政体制的基本内涵和在逻辑入手，以行政权力为核心，以行政体制的构成要素为基线 and 主要内容，分析比较了各国行政权力的运行、内外部关系及其所处的环境。这些要素包括行政领导体

制、政府首脑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职能和机构、地方政府、中央与地方关系、行政管理模式等。全书围绕这些构成要素进行谋篇布局，阐释基本原理，描述客观事实，勾勒发展趋势，逻辑体系严谨，内容条理清晰，结构系统完整。这对于我们溯本求源，从理论层面上去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行政体制、行政权力的本质及其构成，从而更好地去思考和推动改革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是把握了行政体制的个体差异和影响政府治理的共性因素。一个国家的行政体制受到其所处环境的影响，深深扎根于本国的文化和传统，其形成和发

展是一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特征的行政体制，具有各自的特色。同时，各国政府在治理经济社会的过程中，也面对一些相同或类似的问题，在行政体制上有着一些相通的特征和影响行政体制的因素。《比较行政体制》一书，选取代表性的国家，采取解释性的视角，既考察了这些国家行政体制的具体差异具体情境，又注重从差异中寻找共同点，归纳提炼出了各国行政体制中一些共性和规律性的东西，这有利于我们更加辩证地看待和吸收借鉴各国行政体制中的有益经验。

三是既有制度层面的静态比较分

在比较鉴别中彰显中国行政特色

□ 伏 宁 徐兰飞

析，又考察了体制的动态演进和发展趋势。实践是发展变化的，改革也是要与时俱进的。各个国家的行政体制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的调整和变革。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各方面体制已比较稳定，但面对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也在不断地调适完善。《比较行政体制》的一个很大亮点在于，不是单纯地对各国行政体制作静态的比较，而是着力拉长比较的视野，更加注重考察体制的历史演变进程，分析未来发展趋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每一章的最后一部分，对涉及该章主题的改革发展趋势作了描绘分析，真实全面地反映了不同国家行政体制和行政实践的切实。这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加全面的视角来审视行政体制的改革和演变，从而寻找到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最佳政府治理模式。

书评